

吕东来 著

台儿庄 大战

中的中共党员
(下)

一幅英勇悲壮的台儿庄抗战全景画
一曲雄壮豪迈的抗击日寇的民族交响乐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台儿庄大战

台儿庄大战中的 中共党员

(下)

吕东来 著



团结出版社

第五章 台儿庄序战之滕县保卫战中的中共党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1937年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蒋任刘湘为七战区司令长官，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邓锡侯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参加太原会战。当由川东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汉口时，蒋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

1937年底，第二十二集团军调归第五战区，属李宗仁指挥管辖。1938年1月初，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开赴山东滕县。在抗击日军的滕县保卫战中，该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师参谋长赵渭滨、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及数千名官兵阵亡殉国，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一、中共与川军的统一战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地区（包括现在的重庆）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926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率领的北伐军占领武汉，12月四川军阀全部正式改易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虽然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全国的统一，但是四川地方军阀的内斗尚未终结。

1932年9月，经过多年的经营，在先后击败杨森和刘文辉等众多竞争者后，刘湘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形式上统一了全川，成为四川

省主席和四川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节制川中各派军阀。另外四川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实力派，主要有西康二十四军刘文辉，川西二十八军邓锡侯，川北二十九军田颂尧，重庆二十军杨森等，以上这些实力派人物对四川军政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邀刘湘到南京，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与蒋介石反复磋商“围剿”红军事宜，随后，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进入四川，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开始进入四川。1935年蒋介石追击长征中的红军至四川，带着统一西南军政这一另外目的，1月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正式入川，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中央化趋势加强。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规定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军费减发三分之一。8月，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

随着中央军的入川，遂与四川地方军队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便利用与川军多为故交、同乡或滇军旧部的关系，积极开展对川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5月，朱德写信给杨森侄儿杨汉忠，要他认清形势，不要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12月25日，朱德发表了致川军将领的公开信，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下决心要灭亡中国，大敌当前，川军应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反蒋抗日。信中还具体提出了订立抗日军事协定的三项条件。此后，他又接连给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十九军军长孙震，以及川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等过去旧友写信，晓以“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并明白告知：“不愿与先生等以兵戎相见于四川”，希望与川军联盟救国，共赴国难。考虑到川军与蒋介石矛盾较深和川军将领的具体处境，朱德提出“倘因处在蒋贼严密监视之下，一时不便动作，则建立爱国友谊关系，相约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

朱德的信既使川军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解除了川军的顾虑，又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排斥异己、借刀杀人的阴谋。杨森接信后，即令部队给北上红军让道，邓锡侯也密令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路程。尽管蒋介石多次下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只是尾随红军之后，假装追击，以应付蒋介石。朱德对川军将领所做的工作，为红军顺利出川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也深以为虑，不得不想办法对抗。首先，他在改组省政府时，任用自己的亲信。另外，刘湘还宣布废除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在军队方面，刘湘仿效蒋介石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松散组织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



青年时期的朱德

中共也加强了对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于促进川军走上联共、拒蒋、抗日之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刘湘本身是四川财阀的代表，与金融界、实业界关系紧密，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张澜、黄慕颜与刘湘等关系也比较密切，刘湘重要部属潘文华与中共川康特委联系也很紧密。1935年夏秋，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他利用傅春吾等与刘湘的个人关系，密切与四川知名人士的沟通，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刘湘与张澜相识，张澜尽力帮助，道义与利害相结合，使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秋天，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1936年4月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刘湘又派张斯可到桂林与在桂林的红军代表廖广云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蒋。经过这一协定，中共中央稳定了西南局面，得以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1937年，中共中央又派罗世文为代表来成都与刘湘联系，刘湘聘罗为顾问，并任命罗为政治教官。同时，中共四川党组织还积极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也派人到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田颂尧所部做统一战线工作，应该说，这些川军将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



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张曙时

毛泽东曾指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四川实力派对蒋介石集团进入四川既有戒心又十分无奈，他们既害怕蒋介石对自身的排挤，同时难以抗拒中央军的强大实力，又有联合中共抗日的强烈愿望，这为中共在四川组织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

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后，其旧部潘文华等与中共川康特委依然保持了联系。另外中共还广泛深入川军中下层官兵中开展抗日宣传运动，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军

入伍，支援前线，中共举办的各种宣传杂志和报刊，也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后，邓锡侯被委任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

早在护国讨袁战争中，邓锡侯奉命进入泸州棉花坡南翼的马鞍山阵地，北翼则由朱德所部防守。他们两部相互支持，并肩战斗，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邓锡侯与朱德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37年9月，邓锡侯率部沿川陕公路徒步北上，奔赴抗日前线。于11月1日进驻山西寿阳。

1937年11月5日，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带着丁玲及十几名士兵来到山西寿阳马首村看望驻扎在这里的邓锡侯、孙震等，向他们告知现在情况严重，阎锡山已离开太原，由傅作义留守，情况危急，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回援太原，嘱邓赶快准备。

邓锡侯鉴于战局突变，即同孙震、陈离等会商决定，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太原。11月6日，将要到达太原南畔村时，因为向导是汉奸，陷入敌人包围圈，邓差点遇险。以后每年11月6日，邓都以这一天作为他的“抗日遇险纪念日”。

1937年11月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同心花店，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司令部也驻在洪洞县东关外约

八九里远的一个村庄。其间，邓锡侯与朱德曾多次会晤。邓锡侯还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朱德在讲课前称赞川军是他遇到的所有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差却打得最顽强的军队，表现很不错，消灭了不少日军，为掩护友军撤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结合东线战事和整个太原战役，尤其是以川军官兵大多了解的事情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游击战术的道理和实战应用方法。最后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注意和当地群众紧密结合、打成一片，并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整传授。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还经常为二十二集团军表演鼓舞士气的精彩节目，增强了川军抗战的爱国热情。八路军和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两军官兵合作良好。朱总司令离开洪洞县时，还特意送给邓锡侯、陈离共六匹缴获日军的战马。邓锡侯也回送朱德一批手枪，以后还派部下张鹏翼等赴延安“抗大”学习。^①

二、中共党组织在邓锡侯部及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七师^②

1926年，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势如破竹，北进两湖，10月10日直取武汉。四川各派军阀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大革命，并将所部改编易帜，统称为“国民革命军”。12月，邓锡侯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陈离担任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继续驻防新都、广汉。

陈离作为一名有思想、有建树的青年军官，他在《自述》中写道：

“1926年，汹涌澎湃的国民革命洪流已经弥漫四川，甚至像新都、广汉这样的角落，革命进步书刊也如潮水般涌来。在这些书刊帮助下，我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开始深深地思索：为什么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后，革命即一蹶不振？为什么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改组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很快就得到胜利？这无疑是有苏联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合作，进行革命斗争才有的结果。我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得到成功这个真理，从而克服了过去个人英雄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与

^①高勇：《朱德与抗日川军》《四川档案》2006年第6期。

^②本节参考金雷：《陈离将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3月。

作风，开始下决心，愿靠近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陈离一贯亲共的倾向，使人们称他为“桃色”将军。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率先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杀害了包括杨闇公在内的三百余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川省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付烈到四川清理和恢复党组织。8月在重庆建立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付烈任书记。不久，临时省委在成都组建川西特委，付烈派刘愿庵担任川西特委书记，负责领导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下党革命工作。

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庵来到成都，很快通过共产党员车耀先^①的牵线搭桥，频频接触陈离、吴景伯、张志和等四川著名“左派”亲共将领和共产党人。

此时，国共合作早已破裂，而陈离对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却没有改变。当刘愿庵要求陈离设法掩护和转移中共党员时，陈离欣然接受。1927年冬，第一批四名共产党员陈晓岚、邓作楷、曹仲英、沈首群等从成都转移到广汉陈离的部队。陈离高兴地对他们说：“我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我的部队，欢迎你们来！”

陈离把他们转移到广汉，全部予以重用。他委任陈晓岚为第一团政治指导员，邓作楷为第二团政治指导员，曹仲英为旅部秘书，沈首群为旅部政治训练室主任。

不久，刘愿庵告知陈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张秀熟要到广汉暂住一段时间。陈离把张秀熟安排到第二团团部住下，由邓作楷陪同。

张秀熟回成都后，即介绍陈离手下的旅部参谋长刘的均、第二团团团长陶凯、第二团第三营营长曾学圃三人加入了共产党。一年后，刘愿庵被选为中共“六大”的四川代表，张秀熟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

从1927年开始，陈离接受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庵的请求，陆续转移了很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广汉。比较著名的有曹获秋、朱近之、帅

^①车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县人。早年投身川军，由司务长、连长升为团长，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徘徊苦闷中信仰过基督教。1928年东渡日本，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以经营“努力餐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在成都主办“注音符号传习班”，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进行抗日宣传，成为成都抗日救亡领导人。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重庆渣滓洞监狱。1946年8月18日，牺牲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

惠仙、徐一平、雷志烈（女）、李司克、苏端佩、杜桴生等。另外还有三三一惨案被害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杨闇公的妹妹杨亚柏和侄女杨绍兰。陈离给这批转移过来的人员都一一安排了工作。曹荻秋任广汉中学训育主任，帅惠仙任第二团陶凯团部的书记官，雷志烈任广汉女中校长，杨亚柏、杨绍兰任小学教师，苏端佩任第三团团部书记官，李司克任女小教师，杜桴生任曾学圃营书记官，所有人员均有任职。

1930年，陈离同刘的均、陶凯、曾学圃、钟克容等五个人，成立了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五育社”。由时任中共广汉特委书记、温江县工委书记曹荻秋领导，在部队内部作为改造旧军队的核心。他们在广汉三水关焚香盟誓，各不背离，“要干，大家一起干！”陶凯负责军事，刘的均负责军训和财务，曾学圃负责广汉、新都两县地方建设，钟克容负责政治训练，陈离负责掩护革命力量、改造旧军队和对外应付反动政权的工作。他们每周一次，在成都青石桥的陈离公馆秘密开会，研究军政大计。另外又组织了一个公开的政治训练委员会，陈离任主任委员，邓作楷、陶凯、钟克容等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鼓舞士气；另一方面是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刘的均负责组成军事教导队，轮训全旅各级军官，加强思想教育。

曾学圃营驻唐家寺，他组织了一个“晨兴守约会”，要求全体军官都加入，每天早上按时签到；又组织了“青白剧社”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演出活动；设立“学圃读书室”，组织士兵阅读进步书刊，用革命思想武装士兵。曾学圃的过激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当地封建势力的反对，陈离为了掩护曾学圃，把他调到驻广汉的第二团三营做营长。

多年以后，曾在陈离部队工作过的共产党人何翔迥回忆说：

“陈离对部队的训练，采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管教从严，待遇从宽的办法，努力提高官兵的进步思想，要求官兵自觉遵守军纪。他关心官兵的生活和困难，注重医疗卫生设备，按时对官兵发放薪饷。该旅对官兵除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外，还要进行文化教育，每月进行一次文化测验。陈离曾自夸地说，他的官兵都有一定的知识，随便抽一个士兵出来，都可以点评国内外的形势。”

为了进一步改造部队，陈离决定从成都招收一班学生队，约有一百人。共产党川西特委乘此机会输送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入伍。学生队设在

广汉城关武庙后院，学制两年，毕业后分配到连队做骨干。

川西特委还把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派到陈离部队去做文书工作。他们在连队开办文化夜校，组织士兵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开展体育、歌咏、演剧等文体活动，以丰富连队文化生活，逐步改变士兵的恶习。到广汉起义爆发前，陈离部队已发展有共产党员近二百人，全旅三个团、八个营半数以上均有共产党的组织。

1930年秋，中共地下党在广汉陈离的第二混成旅发动了武装起义。广汉兵变的消息传到成都，成都的各大军阀大为震恐，指责陈离长期掩护共产党才酿此重大事变，主张对他撤职查办。第二十八军内部各师、旅长想借此来占领新都、广汉的人不少，他们纷纷上书邓锡侯，要求取消其防区。

邓锡侯对陈离一向信任，把他作为少数几个亲信之一，此次事件也得到了邓锡侯的庇佑，仅仅象征性地给了一个“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责令他“自行筹措，重建部队，掀起足额，听候点验”并继续保留新都、广汉防区。不久，邓锡侯还派他的顾问康记鸿前往广汉慰问地方人士，同时电召陈离到成都面商善后事宜。

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随后成立清共委员会逮捕、囚禁了一百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被开列判处死刑的有曹仲英、柯仲生、陈同生、李斯克、杨芳型、陈鹏、王耀东、王炳南等。

邓锡侯还要求陈离交出曾学圃等共产党员。陈离对邓锡侯说：“曾学圃早已离开部队，其他共产党员我不知道。”实际上，陈晓岚去芬兰、邓作楷去北京大学、曾学圃去上海，都是陈离资助的。邓锡侯听了陈离的话，也不再深究，使陈离得以从容地把其他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广汉转移出去。苏端佩、杨绍兰、杨亚柏等都是在起义失败后，陆续离开新都、广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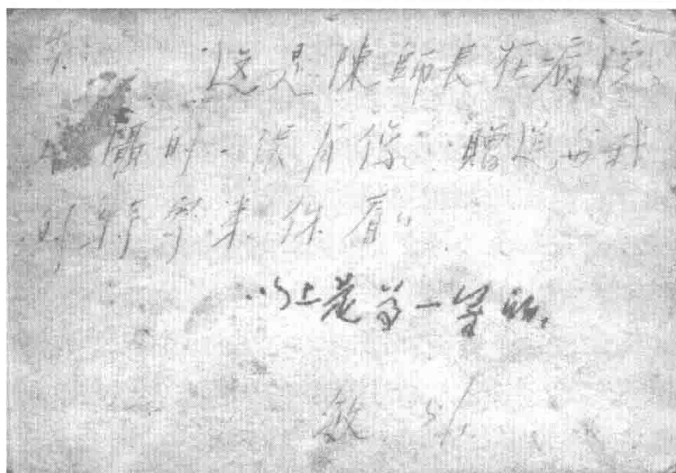
在如此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陈离仍然用实际行动，支持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受到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川西行动委员会领导的赞扬。但是，当清共委员会拿出真凭实据，要处决那些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时，陈离是想保也不能保，想保也保不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共产党人走上刑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侄子陈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邓锡侯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下辖孙震第四十一军（王铭章一二二师、孙震兼一二四师）、邓锡侯兼四十五军（陈鼎勋一二五师、陈离一二七师）。9月，中共上海特科党员张晓峰带着车耀先写的全川军事情报，到西安办事处交给林伯渠，并向林伯渠汇报了陈离为党工作的情况。林伯渠说：“陈离到西安后，我要见他，你安排一下。”陈离抵达

西安后，张晓峰立即联系两人的见面事宜。当时，虽然国共已经合作，但对于两党之间公开的来往仍存戒心。陈离下榻的西京招待所，住的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林伯渠不便前去拜访。同样，陈离也不便去拜访林伯渠。于是，两人约定在西京招待所旁边一个名叫鼓楼旅馆的小饭店见面。张晓峰先把陈离接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然后再同林伯渠一起乘车前来。林伯渠此时年过五十，头发雪白，怕被人发现，还特地借了一个小战士的帽子戴上。林伯渠与陈离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虽然为避耳目，他们已经长话短说，但会谈还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根据林伯渠的建议，陈离安排张晓峰担任一二七师师部少校副官，负责同八路军的联络。陈离后来率部到山西，即由张晓峰拿着林伯渠的介绍信陪同去会晤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陈离后又派张晓峰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董必武，并送去法币二千元，作为捐赠在汉口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董必武即派了冯成琦、翟醒楚、赵尊一三名中共党员，随张晓峰到滕县，参加一二七师担架连工作。

1937年底，第二十二集团军调离山西划拨徐州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为粉碎日军会攻徐州的阴谋，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承担了在滕县阻击日军南下徐州的任务。

3月14日，滕县外围阵地逐个被日军击破，第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已在滕县外围被敌人打垮、冲散。保卫滕县的中国守军大都在滕县外围，滕县县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强敌压境，然而此时的滕县县城几乎是一座空城，当时城内仅驻有第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第一二七师3个师的师部和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1个警卫连、1个通信连和1个卫生队，城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在守军浴血坚守3天后，17日晨，陈离带上他的幕僚、随从和特务连，出西门直奔南沙河。行至距南沙河一里远的地方，突遇日军骑兵和坦克，队伍被包围在一块开阔地带。大炮、机关枪不断射来，此地毫无隐蔽之处，陈离身先士卒，率领士兵与日军交锋，肉搏数次，伤亡过半。在击退敌人后，陈离率众边打边撤。突然，陈离的右腿被日军机关枪洞穿，子弹从大腿射入，从臀部穿出，血流如注。此刻距日军仅一百五十米左右，带着伤，陈离在众人的扶持下边打边跑，来到一处乱坟堆，陈离命令大家顺势在坟堆里隐蔽下来。此时的陈离，已几度陷入昏迷。隐隐约约，大队的敌人远远地在移动，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这支隐藏在坟堆里的队伍。直到夕阳西下，日军怯于夜战收兵。四十五军代军长、一二七师师长、前线总指挥陈离绝处逢生，终于同死神擦肩而过！他是二十二集团军受重伤的最高长官。陈离在警卫吴兆祥、罗昆的扶助下行进到一个村



滕县保卫战负伤后，陈离师长在汉口协和医院。

落，在老百姓的家里将大腿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深夜即绕过敌哨，转至临城，后由张晓峰、赵尊一夫妻帮助，搭乘火车至徐州，再安全转移到汉口协和医院治疗。而与陈离在军官学堂是老同学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却没有那么幸运，于17日傍晚牺牲在滕县城内。

张晓峰的儿媳、著名剧作家沈虹光女士在《壮士无言》^①一书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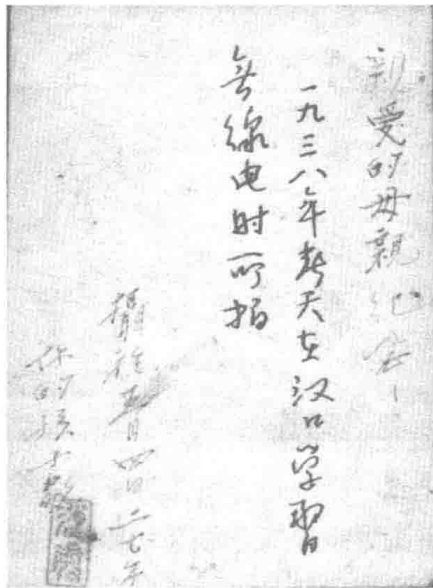
滕县战役结束后，赵尊一护送负伤的陈离师长南下，到汉口疗伤。

躺在病床上的陈离拍了一张照片，靠里有一盆鲜花，枕头垫高了一些，枕套上有绣花——公公（即张晓峰）说，那是母亲（即赵尊一）绣的。绣花部分压在陈离头下，看不完全，似乎是英文，就像母亲在上海南京路启昌照相馆拍的照片上印的英文，花哨的美术体，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字幕的风格。母亲在照片背面写道：“这是陈师长在病院拍摄的一张肖像，赠送与我的，特寄来你看看。”落款是“敏”。

为什么要“寄”给公公呢？因为公公又回到了徐州战场。台儿庄大捷后，五月份徐州又打起来，公公回部队参战，而后随部队辗转经安徽到湖北，回到第五战区，在樊城与陈师长会合，再一次由死亡之地中走出，见到了母亲。

^①沈虹光：《壮士无言》，第128—129页，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5年6月。

母亲在汉口也拍了照片，这就是她留下来的第三张单人照。



照片背面中间两行字为丈夫张晓峰所写

在滕县炮火中奔逐了两个多月，她明显地清瘦了，比出狱时还显单薄。初夏了，换了短袖布旗袍，一条细带挂在颈项上，端头塞入旗袍右边大襟，可能是钢笔。旗袍是浅色的，细带是深色的，密排的领扣抵到下颌，包裹着脖子，显得很纤秀。照片背面有字：“亲爱的母亲纪念！摄于五月四日二十七年你的孩子敏。”这是寄给上海外婆的，母亲又用了“亲爱的”，然后是“你的孩子”，这是她心底最柔软的一部分。

母亲的第一张单人照片摄于1930年之前，第三张摄于1938年初夏，跨度将近十年，是母亲不同境遇的写真，生离死别，何等沧桑！可是，我惊讶母亲的变化竟然不大。还有她的表情，一直不笑，也不悲切，十年了，就那么坦然地直面，仿佛有一种不变的东西沉淀在她已然变化的外表之下，稳住了她，岁月战火也没奈何。

这张照片背后公公也写了两行小字，“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汉口学习无线电时所拍”。

时任一二七师军法处处长的杨尚仑在陈离师长负伤期间，在汉口协和医院看护疗伤的陈离师长。

1938年7月，陈离伤愈重返抗日前线。早在5月份，徐州失守前夕，第一二七师从徐州撤至河南信阳，师部冷副官长奉陈离之命，负责收容散兵游



陈离在汉口协和医院疗伤，中立者为陈离部军法处处长杨尚仑。

勇，一路收容了千余人。武汉会战打响后，日军对武汉三镇实行战略包围，第一二七师又奉命开赴湖北随县高城一带驻防。军需杨月湘鉴于敌人要切断陇海线，担心自己经手的部队经费和账务丢失，经陈离同意，先行一步，携带账务、军

款、家属提前到达樊城，为陈离设置了临时公馆。

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从武汉撤到重庆。行前，决定派中共党员钱俊瑞、胡绳、李相符等人，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开展鄂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其中钱俊瑞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员张执一领导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也转移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樊城。陈离得知这些情况，主动与钱俊瑞、张执一保持密切联系。

尽管李宗仁知道钱俊瑞是中共党员，但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所以对共产党的活动通常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第五战区的地下党员特别活跃，但都是单线联系。在钱俊瑞、张执一的领导下，中共地下党人源源不断地来到第五战区，其中包括陈离安排在第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政治部主任陈烈贻、胡春浦^①、易野源（即田拓夫，据胡春浦1969年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易野源曾在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设计院工作）等人。

^①胡春浦（1913—1983）四川渠县人。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中央特科。受派遣入川军从事情报、军运及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随二十二集团军开赴湖北第二战区，任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开办企业、结交袍哥、发展统战关系，为中共提供经费。曾三次被捕，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未暴露，经多方营救均脱险于刑场或囹圄。1949年被营救出渣滓洞后，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并代表军管会接管成都。

1950年后，在中央情报、外事、外贸机关工作，后任宁夏区委统战部长。“文革”中受严重迫害；晚年回四川任省委统战部顾问。

1938年6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王梓木同志,代表党组织分配郑绍文^①到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当政治教官。郑绍文拿着冯玉祥将军的介绍信到河南鄆城,先后见到张克侠和张自忠将军,随后来见张克侠和张自忠将军的还有曹荻秋^②、任泊生。^③张自忠将军封他们三人少校军衔,月薪八十元。但是到职不久,身份暴露,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团董升堂逼郑绍文和曹荻秋离开干训团。

正当郑绍文和曹荻秋离开干训团,准备经老河口、襄樊回四川重庆的时候,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胡绳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于1930年在陈离的部队内发动广汉起义的曹荻秋,意外打听到陈离率第一二七师驻守高城的消息,于是叫上郑绍文一道,不顾风雪前去拜访陈离,他们这些老友在此相会了。由于在滕县组建的第一二七师担架连几乎在滕县保卫战中全部牺牲,于是,陈离向曹荻秋、郑绍文提出重新帮助第一二七师组建一个担架队的要求。后来,陈离同郑绍文商量,又以第四十五军副军长身

①郑绍文(1905.11—1993.10.8)四川省潼南县三江乡(今重庆市潼南县小渡镇)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至1933年,曾四次被捕入狱。

战争年代,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江汉行署主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4年2月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1958年12月被调广西,先后任地区副专员、农垦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农办副主任等职务。“文革”中,受到迫害。1979年1月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②曹荻秋(1909.8.1—1976.3.29)名聪,字仲榜,号健民,四川资阳县南津驿和平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汉苏维埃政府的创立者、新四军老战士。

1949年11月起,先后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三、第二、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重庆市副市长、市长。1955年11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长。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文革”期间,迫害为“大叛徒”。

③任泊生(1909—1990)原名任康林,东莞常平镇金美村人。出生于越南一侨商家庭。少年回国就读于广州知用中学。1927年在武汉加入叶剑英的军事教导团。

1937年3月,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汉口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武汉国民党军政治部第三厅、新四军等处工作。1945年任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副部长兼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46年后在上海、昆明从事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任广州民航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民航总局飞行处正师级处长。1953年后,先后在国务院对外友协、广州外事办公室、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等部门工作。1979年3月,任广东省科委副主任,是广东省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

份向军长陈书农建议，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驻第二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下面成立一个政工队，由郑绍文主要负责。政工队一成立，第二十二集团军特派员办公室便给郑绍文发了委任状。由于特派员办公室负责人易野源是地下党员，全权负责一应事务，因此所有人事和具体事务都是由易野源、胡春浦和郑绍文一手经办的。

1939年9月中旬，驻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黄宇齐^①为特派员到襄樊地区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开展工作。曹荻秋因在第五战区身份暴露，已被调回中原局工作。由于曹荻秋同陈离关系密切，黄宇齐带着曹荻秋的介绍信到襄阳找到杨尚仑，通过他联系陈离见面。黄宇齐将中原局的介绍信交给陈离，谈了党对陈离的希望和要求。陈离考虑得很仔细，让黄宇齐写一封江津同乡、旧川军师长甘德明介绍黄宇齐来找陈离“谋职”的信，交师部存档备查。然后，陈离让黄宇齐自选想做的官职，因为“编外”可以少办公，自由活动。“中尉”官小，不引人注目，黄宇齐便成为师部副官处的“编外”中尉书记官。一切安排好后，黄宇齐便到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同总部情报处正副处长、中共党员地下刘景素、刘蜀道等研究工作，于10月10日返回襄阳，到副官处正式“任职”。

陈离除向黄宇齐介绍第二十二集团军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外，一切国民党中央发给军部、师部的机密文件都及时给黄宇齐看，黄宇齐将所看到的文件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原局。

1940年的一天，李宗仁对陈离厉声说：“根据政治部的情报，你师有异党分子。按五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你要迅速处理，小心大祸临头。”陈离接过文件一看，原来是中共中原局派到鄂北老河口做统战工作的项乃光被捕，供出了共产党在第五战区的活动情况和共产党员的名单：张晓峰、杨尚仑、张鹏翼、黄宇齐等名字历历在目，还包括陈离同新四军接触的一些事情。

^①黄宇齐（1911.08—2011.03）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人。1929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社联法南区委员，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部干事，上海社会科学家联合会常委，国民党政府第二十二集团军中共特派员，新四军第五师锄奸部部长、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新四军抗大十分校教育长，中共中央中原局武汉工委书记，中原军区一纵队敌工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事组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九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处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敌工部部长，四野南下工作团教务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民政厅厅长、工业厅厅长，电力工业部中南电业管理局局长，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经委（工交办）副主任，1979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兼华东电业管理局局长。

陈离带着文件马上返回师部，向张晓峰、黄宇齐等人通报了情况，并给了黄宇齐一百张特别通行证和经费，让他组织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陈离的资助下，黄宇齐、杨尚仑等共产党员得以安返新四军。杨尚仑临走时，向杨月湘嘱咐道：“我们走了，你要注意，新任的副师长王澄熙，曾在南京受过蓝衣社训练，小心他加害于你。”杨月湘听后，又动了要走的念头，便向陈离提出辞呈：“我们都走了，上司追究下来，师长也好交待。”但陈离对杨月湘一再挽留，杨月湘只好又搁下了走的念头。至此，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中的中共党员就极少了。

三、第一二七师担架连在滕县保卫战

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的香城、九山、王福庄、金山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日军进犯，并于1月中旬、下旬主动出击，冒雪夜袭两下店的日军，杀伤了部分日军。同时派小部队到兖州、邹县、曲阜之间开展游击战争，在小雪村、鳧村成功地袭击了日军，击毙日军翻译官中岛荣吉以下的官兵40余人，缴获了武器弹药、军用地图、文件、作战资料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邓锡侯和孙震两位总司令亲自到滕县、界河一带视察。川军总司令刘湘在汉口不幸病故后，邓锡侯奉命回川继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孙震升任总司令，陈书农升任第四十五军军长，陈离升任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此时，陈书农仍在郑州养病，即由陈离负责指挥第四十五军在前线作战。

关于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七师在滕县保卫战中的情况，1988年，张晓峰同志晚年撰写了《张庆炎革命回忆录》，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他写道：

二十二集团军奉命调去山东滕县，陈师长想去总部辞行，我写信由二科转给朱总，派来两匹马，接陈师长和我去总部。任弼时主任用一张带衔名片，背面写上林、刘、贺三个师长名字，加盖私章，给我去山东□和八路军接头。朱总问我陈师长和邓总司令需要什么？我说他们的坐骑在太原作战都丢了。朱总派人送给邓、陈等六匹日本洋马。

部队在风临（陵）渡过黄河，我和杨尚仑再去西安，我向林老汇报，他向林老辞行。林老写信将□组织关系介绍到汉口办事处董老（必武）领导，